

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征文选登

周恩来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

刘淮宇

(接上期)

1972年11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听取葛洲坝工程汇报时曾讲:“解放后二十年来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

周恩来在“两弹一星”运筹组织管理中作出的卓越贡献有目共睹。聂荣臻曾说,中国从事原子弹和导弹技术都应归功于周恩来。

二战时期,德、美已经率先研制导弹和核武器。对于世界局势和军事科技斗争形势深刻洞悉的周恩来,很早就意识到了原子弹、火箭的重要性。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曾叫嚣使用原子弹,这引起周恩来高度重视。

1952年5月,在周恩来主持下,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粟裕等中央军委领导人在研究国防建设五年计划时,曾正式酝酿研制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武器问题,并征询过有关科学家的意见,从各方面进行准备、积极创造条件。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会上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刘杰的汇报,这次会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



周恩来与钱学森亲密握手

在中共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策后,国务院、中央军委开始研究发展导弹技术的有关问题。1955年10月8日,在周恩来外交努力下,钱学森从美国回国。

钱学森回国,使周恩来兴奋不已。据王炳南回忆:50年代末,周恩来曾经在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1955年冬,钱学森在叶剑英和陈赓的陪同下去见周恩来。一见面,周恩来就迎上来握着钱学森的手亲切地

说:“你就是钱学森吧?你在美国的事我早有所闻。”他和钱学森热烈地交谈着,并交给钱学森一个任务:写个意见——怎么组织发展航空、导弹研究机构。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钱学森于1956年2月17日提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对中国发展航空及导弹火箭技术,从领导、科研、设计、生产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钱学森认为,健全的航空工业,除了制造工厂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强大的为设计而服务的研究及试验单位,应该有一个做长远及基本研究的单位。这几个部门应该有一个统一领导的机构,做全面规划及安排的工作。钱学森还提出,应该调派高校毕业生到苏联去学习导弹火箭制造工艺,同时请苏联专家为我国设计制造导弹火箭的一系列工厂,预备到1958年生产我国自制的导弹及火箭。

周恩来非常重视钱学森的意见书。2月21日,他逐字逐句地审阅意见书,对个别标点、字、句做了修改,并在标题下署上“钱学森”三个字,然后,他吩咐秘书打印6份。2月22日,周恩来在送请毛泽东审阅的意见书打印



周恩来现场祝贺导弹发射成功

稿上写道:“即送主席阅,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准备在今晚谈原子能时一谈。”

在中央领导同志看了钱学森的意见书之后,周恩来亲自主持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域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由周恩来、聂荣臻、钱学森等负责筹备。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再次出席中央军委会议,作出了成立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发展导弹的决定。会上,周恩来说,中国发展导弹不能等待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进行研究工作,应当采取集中力量,突破一点的方针。

为了解决组建研究院的技术



周恩来现场祝贺导弹发射成功

人才问题,5月29日,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邀请国务院秘书长仲勋、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一机部部长黄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33位有关部门领导人共同研究,提出方案。

过了几天,聂荣臻将需要商调的380名中高级技术人员的名单报送周恩来。周恩来看后对聂荣臻说:“你们需要的干部同各部门商调就可以了。”就这样,任新民、屠守铎、梁守磐、庄逢甘等30多名专家被选调到导弹研究院工作,和当年分配来的10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一起组成了最初的导弹研究队伍,加上随后调入的蔡金涛、黄纬禄、吴朝平、姚桐彬等专家,形成了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第一支骨干队伍。

1956年10月8日,我国第一个导弹火箭研究机构——国防部五院成立,周恩来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院长。这一天,也是中国航天事业诞生的纪念日。

在周恩来的关心和过问下,1957年10月,中苏签署《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苏方承诺在核武器和导弹方面给予中国帮助。

1958年,中央军委决定在西部设立特种工程指挥部,陈士渠上将率十万大军开进戈壁滩。

1959年6月,苏联政府片面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1959年7月,周恩来说,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当时,国内由于大跃进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影响,全国人民吃饭问题出现紧张局面,“两弹”试验基地一度面临断炊的威胁,周恩来为科学家们当后勤,亲自为火箭部队募集粮食,设法从各地调拨生活物资支援试验基地。

1961年4月3日,他说,在掌握尖端技术,这方面要靠科学家劳动者知识分子,大家一起努力,要靠党的领导,国家的领导。曾经有人问过,你们什么时候搞出来?我说,我也不晓得,这是老实话,但是搞得越好,也许越快!我们必须努力突破尖端技术。

1963年3月,邓稼先领导的理论部正式拿出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1963年12月24日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的聚合爆轰中子试验,获得了成功。兰州铀浓缩厂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后,于1964年1月14日拿到了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缩铀产品。

1964年4月2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接见铀矿地质会议人员。

周总理对首次核试验的工作人员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大家在试验基地用精心选出的彩色石块拼成这十六个大字,镶嵌在各工号的戈壁滩上,作为核试验的指导思想。此后,这十六个字便成为航天科研试验长期遵循的座右铭。

在讨论第一次核试验时,周总理十分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核爆炸后的烟云和原子尘的危害,他指定时任中央专门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秘书长刘柏罗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了研究,又亲自派遣卫生部长钱信忠组成卫生防护队,分赴核试验场下风400公里以外的有人区,开展防护工作,确保人员的安全。当时的国际气氛还是很紧张的。周总理请贺龙、聂荣臻两位老帅转告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下达防御任务,要部署全面戒备,严防敌特空袭及破坏。

一切部署就绪后,党中央最后决定10月1日前做好一切准备,年内爆炸。周总理立即要求必须做到绝对保密。他对几位老帅说,今天会后,除了参加会的,对谁都不能讲,我的老伴是老党员,又是中央委员,我保证不对她讲。他还对陈毅同志说:“你可不能讲啊(指不对外宾作任何透露)!”陈毅同志当即操着四川口音说,“我不讲哇。”

在周恩来的周密部署和组织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当天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3000多名演职人员,周总理挥动着双臂向大家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

子弹爆炸成功了。会场立即沸腾起来,人们欢呼、跳跃。周恩来风趣地对大家说,大家可不要把地板震塌了呀。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发展导弹核武器,解决运载工具问题已成为紧迫任务,周恩来在抓氢弹研制的同时特别指出“两弹结合试验”是下一步工作重点。在讨论导弹问题时,周恩来提出要在国防部五院的基础上成立一个部。1964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统一管理导弹工业的科研、设计、试制、生产和基本建设工作,加速导弹工业的发展。钱学森被任命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66年6月30日,周恩来出国访问回北京途中在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停留,观看了中近程地对地导弹发射试验,检查了“两弹结合试验”的有关准备情况。



修筑通往导弹试验基地的铁路路基

当天,周总理下飞机后,在基地代司令员李福泽、政委栗在山等陪同下,乘坐火车前往基地办公生活区。6月的戈壁,骄阳似火。列车在山岩沙岭间缓缓前行。周总理把外国友人赠送的西瓜、芒果等拿出来送给大家品尝。忽然,周总理透过车厢的玻璃窗看见铁路旁有一名战士头顶烈日正在维护路基,便立即要求停车,请工作人员下车送去一个西瓜。当这位汗流满面的年轻战士得知西瓜是周总理送给他的时候,激动地流下了泪水,向缓缓开动的列车招手、敬礼。

在“两弹结合试验”的准备过程中,周恩来一再指示要“绝对保证安全”,指示七机部要保证导弹正常飞行,指示二机部要保证做到在导弹掉下来的情况下不发生核爆炸。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钱学森领导七机部组织有关厂、所保质保量按计划完成了导弹生产任务,并进行了弹体自毁试验,证明安全系统工作正常可靠。

1966年10月27日,装有核弹头

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点火发射,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实现核爆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我国正式开展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作,是在1965年5月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第二十二次中央委员会之后。

1970年4月,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完成新建发射场测试之后,周恩来在京主持会议,通过各方论证认为可以发射,并征得在京中央政治局人员同意。

4月24日发射取得成功,当天周恩来审阅完国防科委送来的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后,乘飞机飞往广州参加第二天由越南、越南南方、老挝、柬埔寨领导人召开的三国四方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宣布,为了庆祝这次会成功,我给你们带来了中国人民的一个礼物,这就是昨天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此后,周恩来又领导和组织了实践一号卫星、返回式卫星的成功发射。周恩来还高度重视发展中国的气象卫星和通信卫星,为中国航天事业逐步发展壮大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对钱学森等科技专家进行了特殊的保护。1969年8月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召开有关国防尖端科研的会议。为了让钱学森等专家放开手脚突破工程技术难关,周恩来当众宣布:“部里由钱学森同志挂帅,杨国宇同志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军管会努力保证钱学森和有关专家的安全,航天科研人员全力攻关,很快出了成果。

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命令,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表彰他为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完)

周恩来基层调研的五项规矩

林宁

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5月3日至6日,周恩来总理来到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主要就农村公共食堂问题进行蹲点调研。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天,从细节中解读周恩来恪守的基层调研规矩,值得今天的领导干部好好学习和发扬。

“突然袭击”的规矩

由于当时生活困难,伯延公社社员食堂以吃玉米糊糊和代食品(把玉米轴、玉米秆、棉花壳、红薯秧、榆树皮等磨成粉,掺入少量的红薯面、玉米面、糠面等煮熟后的充饥食品)度日。早就得知周总理第一天中午要吃社员食堂饭的消息,社队领导精心安排一个社员食堂,一面让社员们提早把饭打走了,让周总理看不到社员吃饭的真实情况,另一面想办法专门给周总理做了面条、馒头、稀饭和红薯。这些情况哪能瞒得过周恩来呢?

第二天中午,周恩来突然提出,还要到社员食堂去吃饭,而且要去另一家食堂。社队领导一下都慌了。原以为周总理昨天去社员食堂吃过一次饭后就不会再去了,因此没有提前做好任何准备。周恩来来到一个食堂,只有炊事员和司务长还在,其他社员已吃完饭回家了。跟随的公社领导对周恩来说:“总理,食堂没有饭了,还是回公社吃吧。”周恩来不说话,径直奔向灶台揭开锅盖,锅里还剩下玉米糊糊。他问

道:“这不是还有吗?”有人回答说:“这是炊事员吃的。”“那好嘛,我与炊事员一块儿吃。”周恩来叫炊事员盛了一碗玉米糊糊,还掰了一小块代食品。过后派人送来1两粮票,5分钱饭费。

这次“突袭”,周恩来吃上了真正的社员食堂饭,了解到了农村公共食堂的真实情况。在尊重基层调研安排的同时,周恩来常常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到那些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安排,没有做过手脚的地方去调查,从中发现问题。他说:“你想摸到真实情况,就不要老是围着别人挑好的地方转,要多到那些事先没有得到通知的地方走一走,在那里你才会看到、听到最为真实的情况。”

躬身求教的规矩

周恩来到了一片杏树园,有二亩多地,栽着六七十棵杏树。在空隙地里,胡银福两口子正在栽红薯秧。周总理边看边问他们红薯怎么栽法,并顺势蹲下来,要帮着胡银福夫妇栽红薯。老胡的妻子李善琴赶紧拦住说:“可别,可别,都是泥。”她给周总理讲,栽红薯要先往坑里倒上水,将红薯秧弯

着按下去,不能直着插进去。还说刚开始没有经验,直着插,结果红薯长得很少。周恩来听后连声说:“对,对,就是得学经验。”

周恩来说过,“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到人民中去生活,才能取得经验,学习到本事”。他一生坚持虚心向群众学习,认为:“在农村中,许多农民比我们勤劳勇敢,比我们有办法;在工厂中的广大工人,我们能生产,比我们能创造;广大的劳动知识分子、学生,有的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强。”在下基层调研中他随时随地留心观察群众,一有机会就躬身向群众求教。

反复核实的规矩

在伯延,周恩来每访社员家,总要到社员存粮的房间走一走,到灶间揭开锅盖看一看。一天中午,工作人员领着周总理来到徐翠叶家中。徐翠叶的婆婆刚从自留地栽红薯回来,正蹲在院内一个墙角烧灶火,准备热点榆叶汤。周恩来走到灶旁揭开锅盖看了看,没说什么盖上了,问徐翠叶的婆

婆:“大娘,锅里煮的什么?”她说:“煮的榆叶汤,糊着把糠面。”听她这么一说,他又一次揭开锅盖细看了一下,嘴里不停地“啧啧”。

周恩来在徐翠叶家第二次揭开锅盖是为了再核实一下第一次揭开锅盖看到的和听徐翠叶婆婆讲的情况。下基层调研就要掌握真实情况,周恩来在调研中很重视基层一线点上和面上情况的反复核实,绝不搞“大概”“可能”“想当然”。他指出:“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才能把工作搞好。还要谦虚谨慎,把情况弄明后再下决心,不能瞎搞。”后来他在1961年6月12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伯延调研情况沉痛地描述说:“除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东西了,硬是没有存粮。”一个“硬”字,就是周恩来在调研中反复核实后的精准的结论。

和群众交朋友的规矩

在参加座谈会之前,伯延社队干部特意向社员张二廷再三交代:“周总理可是大官,千万不能乱说。”在座谈会上,阅人无数的周恩来发现了这位真诚的农民,在周总理的引导下,

张二廷第一个大胆说出了“食堂不好,食堂吃不饱”的真话,说出了“总理,再这样糊弄下去,过两年连您也会没吃的”辣味十足的话。周恩来边听边鼓励,耐心听完张二廷一通话,激动地站起来,握住他的手说:“二廷,你这样一普通农民会被周恩来当作交友对象,而不是其他人。周恩来曾说过:‘每个共产党员都得有几个党外朋友来往,可以多交新朋友,也可以有些固定的朋友,能够反映一些意见,敢于提出意见的。’难得是诤友,张二廷符合周恩来交友的标准。座谈会上他这样评价张二廷:‘你是我下基层时遇到的第一个敢说真话的人。你们批评得很对,我很难过。’”张二廷说的是真理,只有他把我们看作自己人时,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对这位新交的农民朋友,周恩来信守关心朋友、不忘朋友的信条,亲自到张二廷家看望,想办法帮助他抚养孩子,从这以后一直到

“文化大革命”前夕,国务院或周总理办公室每年都有人受周总理委托到伯延看望张二廷。

不把群众隔开的规矩

最后一次座谈会是5月6日下午在供销社院内的大厦进行,开完这个座谈会周恩来在伯延的调研就结束了。会议结束从屋里一出来,周恩来看到供销社大院内和门前的元宝坑广场上,密密麻麻的全是人。原来是附近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听到周总理要来的消息,纷纷赶来向周总理,约有一千多人。周总理的车停在村北,但是向北的路已经被沸腾的乡亲们堵住了,大家簇拥着周总理,都想和周总理握个手,警卫们拦也拦不住。周恩来一看这种场景,不让警卫拨开向北的人群,而跟簇拥的乡亲们向南走,慢慢绕着元宝坑广场走了一个大圈儿,并频频向乡亲们招手致意。

“不要把人民群众隔开”“不要使同群众有距离”,这是周恩来下基层调研对地方领导常嘱咐的一句话。他对不让群众见领导,或者让群众为领导让路,很反感,曾气愤地说:“例如我们领导同志走到哪里,就把众人拦住,为我们让路,你要平等待人,就不行,有些人一定把你搞得很特殊。我也不反对必要的警惕性,本来是坐在一起的,为什么要隔开?我看这就是一种习惯势力,是封建的,有时不知不觉就出来了。”